

培力還是侷限？： 兒少安置機構、慣習形塑 與階級效應*

陳旺德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研發組長

陳伯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林昱瑄**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 本研究之田野資料來自科技部補助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失敗的起跑點：育幼院如何『成功』打造院童的『魯蛇』人生」(105-2815-C-343-018-H)。本計畫由當時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大三學生陳旺德提出申請，林昱瑄與陳伯偉共同指導，研究成果獲得 105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後經改寫、補充訪談資料乃成本文。本文三位作者之分工為：陳旺德負責田野資料蒐集與撰寫論文初稿，陳伯偉負責理論架構與分析觀點之提供，林昱瑄負責投稿與審查過程之文章修改。寫作過程感謝科技部提供經費補助，以及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專業的意見，協助本文論點更臻周全。最後感謝參與本研究的所有受訪者，願您們真誠、慷慨的分享可以促成兒少安置機構的改善，僅以此文向您們致敬。

** 通訊作者 E-mail: linyusuan@gmail.com

2019 年 11 月 25 日收稿；2020 年 06 月 08 日確定刊登。

摘要

兒少安置機構為國家提供弱勢兒少保護的福利服務，其目標在促進服務使用者身心健全發展，然而，過往研究顯示接受安置兒少離院後多有社會適應的問題，少有晉身專業中產階級的案例，其中安置經驗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但目前少有研究探討離院青年的階級處境與安置經驗兩者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服務使用者的經驗出發，透過社會心理分析取徑，瞭解安置機構的場域規則如何形塑兒少特定的慣習？以及這些攸關階級的認同和情感，如何影響青年離院後的階級處境？本研究使用先由 Pierre Bourdieu 提出，後經 Diane Reay 及 Andrew Sayer 等人補充的「慣習」概念，分析兒少安置機構（場域）、服務使用者慣習及其離院後的階級處境三者間的關係。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深度訪談 15 名目前已離院自立生活青年，並輔以 1 間機構的參與觀察。研究發現兒少安置機構透過層層管制的外在物資供給，以及聽話惜福的內在價值灌輸，形塑服務使用者生產平凡就好的生涯圖像與經常感到羞恥、自責的階級情感。影響所及，離院青年的階級處境雖不乏穩定就業與高學歷的例子，但仍以從事勞工階級職業與低自我評價為主要基調。本研究結果將提供兒少安置機構主管機關與工作人員作為優化服務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兒少安置機構、慣習、階級情感、羞恥感、階級處境

壹、前言

兒少機構安置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的最後一道防線，主要功能在於當家庭發生特殊狀況以致危害到兒少身心發展或受教養權益時，提供一個短暫性庇護的場所，並在安置期間內滿足其身體心理的發展需求、發展正向社會關係與個人潛能（胡中宜、彭淑華，2013：52；彭淑華，2007；曾華源，2009）。然而，根據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2007）對育幼院離院生的調查指出，離院兒少能持續升學者不到一半，沒有繼續升學者，也有 5 成以上無法穩定工作。國內學者胡中宜、彭淑華（2013）運用問卷調查分析 89 位離院自立生活個案也發現，他們普遍教育程度偏低，未就業者加上僅從事兼職工作者，占 6 成之多，平常財務狀態入不敷出或勉強平衡者，亦占 3 成以上，尤其在心理健康方面，具情緒困擾者約占 3 成，顯示這群離院自立個案的生活現況相較同齡青年格外辛苦。

上述研究發現亦呼應筆者¹自身的經驗和觀察。筆者本身有 13 年在育幼院生活的經驗，儘管十分感謝機構在我原生家庭遭遇困頓時，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和人身庇護，但筆者離院後卻發現，自育幼院出來的青年常在社會適應上面臨強烈的挫敗與侷限感。在經濟方面，筆者認識的服務使用者有不少人離院後就進入職場，大部分從事需要大量體力、技術替代性高的職業。少數人選擇繼續升學接受高等教育，卻需半工半讀、搏節度日。在心理層面，有不少人提到「我經常感到自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甚至有「輸人一等」的感覺。究竟為何安置機構出身的青年，離院後少有晉身專業中產階級的案例，甚至常會感到自卑不如人？

儘管這個問題沒有單一的答案，包括個案安置前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各方面因素，或是本身韌性、資源多寡、家人支持等，都會影響當事人離

¹ 文中的筆者皆指第一作者。

院後的生活適應和心理健康，然而，相關研究顯示接受安置個案對於安置經驗的圖像與觀點，對其離開後之社會適應有重要影響（胡中宜、彭淑華，2013：57）。為了提高受安置兒少的正向效益，許多研究者關注機構應如何營造有安全感、像家的環境（余姍瑾，2011），或是提供更完備的自立生活協助（胡中宜，2014）與復原力增進方案等（陳怡芳、林怡君、胡中宜，2014），離院準備與支持服務也益發受到重視。儘管上述研究或方案，都很努力想要改善育幼機構服務模式，或者透過特定能力養成或資源供給，提高離院青年在社會上的成功機會，然而，有個根本的問題，卻始終沒有獲得解答，那就是：整體而言，安置經驗對這群服務使用者的身心影響究竟是什麼？這些場域中形塑的慣習在當事人離院後的社會階級處境扮演什麼角色、如何發揮作用？回答上述問題的意義在於，如果我們能從被安置主體的觀點，瞭解過去經驗如何影響離院後的生活，甚至對未來生涯發展的想像，那麼或許在反思當前兒少安置機構服務模式時，更能對症下藥地提供解方。有鑑於此，本研究問題為：對服務使用者而言，連結過去受安置經驗與離院後自立生活適應中間的心理機制與情感經驗究竟為何？這些攸關階級的認同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目前的階級處境？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透過「慣習」這個概念，採社會心理分析取徑檢視兒少安置機構（場域）、服務使用者慣習及其離院後階級處境三者間的關係，以瞭解兒少安置機構的場域規則如何形塑服務使用者特定的慣習，而此種慣習在他們離院後，如何持續影響他們的階級感知和實踐，成為日後生涯發展的限制或養分。

「慣習」最早由 Bourdieu 所提出，是指一套指導行動者以特定方式行動和反應的秉性（disposition），它是個人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產物（邱天助，2002：110-113）。因此使用這個概念就如同採取一種社會心理分析取徑，有助於理解社會結構的驅動力如何透過潛移默化的過程形塑個體特定心理基模，以及過去經驗如何持續在現今生活中無意識地被體現出來。然

而，由於 Bourdieu 在概念化慣習時，過於強調結構由外強加於個體身上造成的限制和要求，忽略個體（有意識）的感知面向以及能動性，因此，後續學者如 Reay（2015）主張將心理反應和個人內在情感世界包含進來，以擴展和豐富這個概念。Sayer（2005）則企圖將慣習的道德傾向或道德情感找回來，填補 Bourdieu 對階級感知的忽視。簡而言之，Bourdieu 使用慣習這個概念是為了突顯階級的文化經濟面向如何被個人以身體化的方式活出來，後續修正論者如 Reay、Sayer 等人則強調階級的心理經濟面向——感覺自己格格不入、不如人等階級情感，如何為個體所內化與體現（Reay, 2015: 13）。為了更全面地瞭解機構服務使用者的慣習，提供一種更整全式的分析，本研究所指稱的慣習除 Bourdieu 的原始論述外，還包含修正論者提出的階級情感與道德評價面向，涵蓋所有無意識、有意識、內省的、認知的、情感的慣習。

慣習經常被使用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中，檢視不同階級（場域）的教養方式如何生產特定慣習。例如 Annette Lareau（2003）研究不同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發現中產階級精心擘劃的教養模式，容易培養孩子由內而外的自尊自信，以及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權利感；反之，勞工階級和貧窮階級的孩子，在自然長大的教養模式下，會被形塑出侷限感。這意味著孩童的學業成就、自我價值感，與階級化的教養方式有關。儘管育幼機構並非家庭，但作為被安置兒少長期生活的環境，他們在這裡接受保護、教養以及社會化，機構的管理、教養文化無可避免地也會影響到服務使用者的秉性、慣習與理想生涯圖像。被安置者每日生活在這個場域中，如何發展並內化與場域相符的認同與慣習，進而在日後人生抉擇中，轉化或抵銷可能的反抗，是筆者好奇的地方。據此，本研究問題如下：一、機構的日常生活安排與教養方式呈現何種場域文化與規則？二、此種場域文化規則形塑服務使用者生產何種慣習？三、服務使用者在成年離院後，其慣習如何影響他們目前的階級處境？為回答以上問題，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訪

談 15 位曾被安置於育幼機構 3 年以上，目前已離院自立生活的服務使用者，年齡分布在 21 到 35 歲間。訪談內容包括機構管理文化、目前生活以及階級感知與情感三部分，並輔以其中 1 間機構的參與觀察。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慣習與場域等概念為基礎，試圖探討在兒少安置機構的管理文化下，服務使用者養成何種生存慣習，以及此種慣習在離院後如何持續影響他們面對人生挑戰、困境的心態與行動，進而形成目前的階級位置和情感認同。本研究少見地從服務使用者的觀點，分析離院青年如何看待及詮釋育幼院管理文化對於他們慣習、秉性的影響，並同時呈現這樣的慣習如何形塑他們目前的階級處境，對於育幼院管理文化可以提供具反身性的洞察，研究結果期待能提供相關機構人員作為改進之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兒少安置機構類型與現況

（一）機構類型與現況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我國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可分為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及其他福利機構等五類。本文所探討的主體為提供家外安置服務的「安置及教養機構」，收容對象包含不適合在家教養或逃家之兒少、無依兒少、未婚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經盡力禁止或矯正而無效果之兒少、應予緊急保護安置之兒少、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之兒少、依法得申請安置保護之情事者。此類機構之設置目標，應以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滿足安置對象發展需求及增強其家庭功能為原則。然而，具有幼性質的兒童安置機構與少年安置機構在性質與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異。

兒童安置機構較接近一般人所認知的育幼院、兒童之家，早從國民政府遷台以來就陸續成立，主要收容 18 歲以下的兒童與少年，由於年齡分布較廣，機構會依經營方向設定收容年齡，但原則上同時收容兒童與少年，也無性別限制；在安置對象的問題類型上，原以收容棄嬰及家庭失依的兒童、青少年為主，但隨著法令及社會環境變遷，目前收容對象擴及兒保個案、性侵害、單親家庭或低收入家庭兒童、受刑人子女，甚至行為偏差少年，服務對象越來越多元（彭淑華，2004）。

少年安置機構大多成立於 1991 至 2000 年間，這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1995）、〈少年事件處理法〉（1997）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03）修正通過有關（翁毓秀，2011）。²少年安置機構主要收容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傾向以性別（如：少年之家、少女之家），而非少年問題作為收容安置的標準（張紉，2000）。安置對象的問題類型以保護安置與法院轉介為最大宗，由於對象問題較為多元，與偏差行為有關聯的比例也較高（翁毓秀，2011）。因此，相較於育幼機構的「福利保護」色彩，少年安置機構有「福利司法化」的傾向，拘禁性與強制性色彩較濃（彭淑華，2006）。

根據衛福部 2019 年的統計資料，台灣的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有 119 家（公立 9 家，私立 93 家，公設民營 17 家）（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但絕大部分都是由民間非營利性質的財團法人所設置，公立或公設民營機

² 1995 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通過後，台灣開始設置專門收容少年的安置機構；1997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後，少年事件處遇轉向為福利處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03）、〈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1995）及〈少年事件處理法〉（1997）的修訂後，少年法院裁定不宜責付法定代理人者，或少年法院裁定兒童應交付感化教育者，得將之安置於寄養家庭或安置於兒童少年機構（翁毓秀，2011：295-296）。

構僅占五分之一。在機構規模方面，若依據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鑑報告的分類標準：安置 25 人以下者為小型；安置 25 至 49 人者為中小型；安置 50 至 99 人者為中大型；安置 100 人以上者為大型。國內的兒少安置機構以小型與中小型為多數（翁毓秀，2011）。

（二）安置機構照顧模式

安置及教養機構基本上並非一個照顧的私領域，比較像一個由專業工作人員及院生共同組成的集體宿舍，其成員組成較家庭複雜，關係也不若家庭緊密，雖然如此，機構卻可提供 24 小時的生活照顧及服務，也可以連結各項資源，豐富孩子的生活（余姍瑾，2011）。在實際執行面上的照顧模式又可分為例行生活照顧模式及特殊生活照顧模式兩種（彭淑華，2006）：

1. 例行生活照顧模式

強調生活經驗正常化（normalcy）的重要性，認為即使安置個案在安置前的生活經驗相當負向，但兒童及少年接受平等無差異之常規生活，特別是接近家庭式的生活型態是可以從中獲益的。在此理念下，我國的政策立法越來越強調兒少安置機構應從團體模式發展為家庭模式（余姍瑾，2011：12-13），例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20 條明訂安置及教養機構生活空間之規劃，應以營造家庭生活氣氛為原則；機構的評鑑指標也強調家庭化互動與生活安排，包括分家而居、有專屬工作人員（家長）負責住家的管理，作息與活動安排依各家特性而不同、家長與兒少接觸時間長且固定等。其中扮演類家長角色者即為專業人員編制中的保育員或生輔員。保育員負責照顧 12 歲以下的兒童，生輔員照顧 12 歲以上之少年。前者的培訓過程比較著重幼兒照顧，後者則重青少年輔導，然實務工作內容並無太大差異，都有可能同時照顧 0 至 18 歲的兒少。

2. 特殊生活照顧模式

由於被安置兒少，大多帶著身心創傷或行為問題來到機構。特殊生活照顧模式意指在例行生活照顧模式外，針對兒少的特殊性問題與需求，有計畫的設計團體生活情境、提供個人多元性的支持、尋求並運用適當的機會或資源等，以正向支持並引導安置兒童或少年朝向期待的改變方向努力（彭淑華，2006）。例如針對創傷經驗的復原力方案（白倩如，2012；陳怡芳等，2014），或是協助即將離院個案發展自立能力的自立生活準備方案（胡中宜，2010，2011；陳俊仲，2011）等皆屬之。

（三）兒少安置機構之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兒少安置機構的相關研究頗為豐碩，主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相關政策法規論述、機構之經營管理、機構服務的樣貌與評估、機構工作人員主觀經驗、被安置兒少主觀經驗，以及離院青年的生活現況等。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機構內的安置經驗對於離院青年後續社會處境的影響，與後三者的關係較為密切，因此，以下分為機構場域文化（包括工作人員觀點與服務使用者觀點）與離院青年生活現況兩個面向回顧相關研究。

1. 機構場域文化

儘管我國法令將兒少安置機構視為具保護性質的福利服務，甚至希望強化家庭式照顧功能，然而，在實際運作上，無論從工作人員視角還是服務使用者觀點，都指出機構存在嚴重的權控性質。以工作人員為主體的研究，例如：彭淑華（2006）深度訪談 29 家福利取向之少年安置機構，共 55 位工作人員，結果發現少年安置機構雖以福利保護為出發點，但實際管理制度卻往權控那端傾斜；又如彭淑華（2007）以焦點團體訪談 52 位

從事兒童少年保護工作，與安置機構有互動經驗的工作人員，發現整體機構文化及制度的運作重慈善輕專業、重成效輕權益、重管理輕輔導，加上保護系統資源不足，容易催化機構虐待的發生。吳惠文與許雅惠（2015）也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發現機構內社工與保育／生輔人員因為分工不均、權力不對等而產生怨懟、嫌隙，導致合作上的困難。雙方衝突除了影響工作人員的專業認同外，也會導致被安置兒少無所適從，非但輔導不成還會造成更大傷害。從服務使用者觀點來看，陳毓文（2008）以問卷調查方式探究接受機構安置少年憂鬱情緒狀況與解釋因素，結果發現不少安置少年為憂鬱之高危險群，而解釋其憂鬱情緒的因素又以機構規範的解釋力最強。可見機構過多的限制與規範是影響服務使用者安置滿意度最重要的因素。余姍瑾（2011）探討歷經長期安置之離院個案如何詮釋「機構如家」的意象。結果發現機構雖依著家庭式照顧理念在機構中分設小家，但畢竟機構空間、資源、人力有限，很多時候仍須以大團體模式進行，兒少沒有專屬於私人的空間、物品甚至財產，選擇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亦十分限縮，很難真正成為他們的家。

2. 離院青年的生活經驗與困境

隨著個案年滿 18 歲、法定安置期間結束或其他因素，個案必須結束安置面臨離院。然而，他們通常因無家可回，缺乏家人支持，或缺乏各種有形無形之資產，離院後受到嚴重的社會排除。例如胡中宜與彭淑華（2013）使用問卷調查 89 位離開兒少安置機構之自立青年，試圖瞭解其生活現況。結果發現多數個案離院時僅具國、高中之教育程度，且未就業者加上僅從事兼職工作者亦占 6 成之多，財務狀態顯示入不敷出或勉強平衡者亦占 3 成以上；在心理健康方面，有情緒困擾者不在少數，可見他們的生活狀況相較同齡青年的確格外辛苦。此外，陳俊仲（2009）與陳思穎（2012）均從社會排除觀點，探討離院個案在教育、就業歷程、社會關係、

生涯發展的社會排除現象，研究結果也發現不少負面經驗；胡中宜（2014）是少數從優勢觀點，探討離院個案在自立過程中，有何促成優勢的要素，希冀找出個人的內在優勢與外在環境優勢因子，作為未來服務之參考。但該研究係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機構工作者，邀請他們分享服務經驗中觀察到的離院個案之優勢關鍵，並非從離院青年觀點出發。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儘管兒少安置機構的相關研究已有豐碩成果，然而，研究主題不是針對安置經驗本身做探討，就是分析青年離院後的現況與困境，很少研究將這兩者連結起來，檢視這些服務使用者的長期安置經驗透過何種社會心理機制，影響他們離院後的社會階級處境。為了從社會心理取徑，瞭解兒少安置機構（場域）、服務使用者慣習以及離院後的階級處境三者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 Bourdieu 提出的慣習概念，以下介紹 Bourdieu 對慣習的原始界定，以及後續修正論者的補充論述。

二、慣習：一個社會心理分析的取徑

（一）Bourdieu 的慣習與場域

慣習是 Bourdieu 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所指的是一套秉性系統，促使行動者以某種方式行動和反應，是人們知覺和鑑賞的基模，提供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動作與反應的核心，影響行動者站立、行走、言談、感覺、思維方式等（邱天助，2002：110-113）。Reay（2004）將慣習視為一種深層、內在，包含許多條件矩陣的複合性核心。舉例來說，當個體作決定時，這些條件矩陣會為個體能作的選擇劃定界線，個體受限於此種內化的框架，無法認知到某些可能性的存在，只能接受某些有限的範圍，因此，選擇被限制在個體所認知到的機會和限制框架中。換言之，慣習可說是社會行動者建構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的生成原則，它會中介客觀的機會和主觀的動機，為個體所能作的選擇畫出界線。

慣習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影響的結果。特定慣習的生產與場域相關，Bourdieu 認為社會空間是依照不同的資本分配而層級化，其採取一種社會位相學，即多面向座標圖，在社會中每一個社會行動者與社群依其所擁有的資本總量而在這社會空間中占有一定位置，相似的群體即處於相近的位置。Bourdieu 提出「慣習（資本）+場域＝實踐」以解釋主體的實踐行動，即「結構產生慣習，慣習決定實踐，實踐再生產結構」，足見主體在行動時，深受置身其中的社會結構影響（周新富，2005）。這說明了為何同處一個文化群體的人們，對於某些事物的觀點和選擇，不需要經過討論就能「英雄所見略同」，這是無意識的，且具有和諧的感覺，而這也是場域中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因素。因此，慣習可以預測「像我們這樣的人們」，遇到什麼情境會表現什麼行為舉止（Reay, 2004: 433），也可以用來分析社會優勢或不利族群在日常互動的慣習中，展現何種文化優越或文化不利態度，這樣的秉性、思維方式與言行舉止如何受到階級、種族、性別的影響（Reay, 2004: 436）。

在 Bourdieu 的理論架構中，如果慣習是主觀的，場域就聚焦在客觀的面向，這兩者互為彼此的重要發展條件，具有緊密動態關係。慣習和場域之間的關係以兩種方式運作，一方面這是條件關係：慣習是將場域本身所需要的秉性身體化的產物；另一方面，這是一種知識或認知建構的關係：慣習促使個體將場域建構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一個充滿價值或感覺的世界，（不）值得投注個人精力（Grenfell & James, 1998: 15）。當慣習遇到熟悉的場域，個體就像魚在水中，不會感覺到水的重量，而且會將這種世界視為理所當然（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27）。反之，當慣習遇到不熟悉的場域，個體將會產生斷裂、格格不入的感受和張力，可能引發持續的協商、反思和轉化（McNay, 2000）。

（二）修正論者：補充慣習的意識、情感面向與能動性

Bourdieu 提出慣習這個概念，讓我們瞭解外在社會結構如何被個體內在化和整合到心理層面，可用來探討個人和其所置身的社會關係如何相互建構，成為一個理解個體社會心理面向的概念；然而，由於 Bourdieu 在概念化慣習時，過於強調結構由外強加於個體身上造成的限制和要求，忽略個體（有意識）的感知面向以及能動性，背後隱含的決定論傾向遭致不少批評（Reay, 2004）。例如 Aarseth、Nielsen 與 Layton（2016）指出，Bourdieu 作品中缺乏理解客觀的矛盾與主觀感受到的情感張力如何交織，以及這些矛盾如何為主體所處理。Derek Robbins（1991）主張應更廣泛地詮釋秉性，納入情感和認知面向。Reay（2004）批評 Bourdieu 採取客觀和科學的取徑，無法充分處理人們生活的情感面向。Sayer（2005）認為 Bourdieu 過度聚焦在慣習的無意識層面，忽略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或是人們的內在自我對話，沒有保留空間給慣習的道德面向或道德情感。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讓慣習充分地發展為一個社會心理學的概念，更全面地瞭解外在社會結構如何為個體內在的心理層面所經歷和中介，同時也不忽略主體能動性，許多學者陸續對 Bourdieu 提出的慣習概念作補充和修正。例如 Reay（2015）主張將心理反應和個人內在情感世界包含進來，以擴展和豐富這個概念。這樣的補充，可讓我們瞭解對個人而言，過去如何在現今被活出來，同時也更能捕捉到跨越熟悉和不熟悉的場域時，人們回應社會世界的自在和不安程度，以及他們如何將外在社會世界內化。因此，Reay 的作品聚焦在情感、心理面向，嘗試書寫社會階級的心理經濟，例如感覺格格不入、比別人差、比別人厲害、發自內心的反感、被認可、被拒絕——如何被內化和展現在實踐中，以及慣習的情感政治對主體而言，如何同時是一種侷限也是滋養。

Sayer（2005）的作品企圖恢復慣習的道德傾向或道德情感，以提高

慣習的可能性，讓我們更瞭解受剝奪者的掙扎和幻滅，以及照護、關心、承諾等，並且將有意識的慎思和無意識的秉性編織在一起，這些都是過往概念化慣習時被邊緣化的部分。不同於 Bourdieu 將階級視為一種耳濡目染的社會化實踐，Sayer（2005）主張階級是一種「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鑲嵌在人們社會互動時所透露出的道德評價，並透過彼此相互比較的過程，提醒自己「值不值得」、「夠不夠格」，影響個體對自我與他人的評價，例如羞恥感就是一種非常階級化的情感。就階級的再生產而言，羞恥感會讓窮苦的人感覺自己又笨又不會說話、講話沒內容或不重要，因此自認沒有說話的權利。透過階級的道德意涵，我們得以將個人情感重新帶入階級的分析視野，並將對階級的理解，擴展到銘刻在日常互動中的複雜情感面向，進而從階級道德情感，解釋社會關係的不平等（Lawler, 2005; Schmitz, Flemmen, & Rosenlund, 2017）。

為了更整全地解釋育幼院的管理模式與教養文化，如何為服務使用者內在心理層面所經歷和中介，從而影響他們離院後的生活樣貌與生涯選擇，乃至這些選擇背後的感受和自我評價，如何回過頭來影響他們目前的階級位置和情感。本研究使用慣習這個概念時，除了 Bourdieu 原先強調的無意識、身體化部分，同時納入後續修正論者，如 Reay、Sayer 等人強調的意識、情感、道德、能動面向，強調結構與能動總是同時存在，且交織共構的觀點。

參、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重視人們的意義建構與事件的情境脈絡。本研究欲從服務使用者角度瞭解他們所經歷的安置機構文化，尤其著重分析此種場域規則與權力運作方式，在青年離院後，如何持續影響他們對自我的（階級）認知

和評價，因而生產特定行動邏輯。這些問題涉及當事人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生活情境的理解和反思，需仰賴質性研究，方得以確實掌握當事人的想法。因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資料蒐集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察為輔，以下為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之方法與過程。

一、深度訪談

本研究為立意取樣，邀請曾在兒少安置機構生活 3 年以上，現已成年離院自立生活之青年為受訪對象。選取理由為受訪者經歷機構內、外兩種不同生活體驗，方能感知不同場域對自身身心發展的影響，同時有機會回顧個體在適應不同社會生活過程的情感與評價。本研究受訪者共有 15 人，性別為 9 男 6 女，年齡介於 21 至 35 歲之間，受訪者基本資料見下表 1。他們待過的機構類型以混齡、混性別的兒童安置機構為主，少數例外的 3 位³受訪者來自少年安置機構，但仍屬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的福利機構，並非司法矯正系統的矯治型安置機構（例如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少年觀護所），或教育系統的中途學校，其受安置原因歸屬一般安置或保護安置類型。因此，本文所指稱的兒少安置機構為社會福利性質，在服務功能上主要強調養育及照顧，以保護兒童及少年成長發展為主。但由於兒童和少年機構間的確存在差異，因此在機構背景資料欄位中，只要是兒童安置機構，皆以「○○育幼院」為化名，少年安置機構則以「○○之家」表示其機構性質為少年或少女中途之家。此外，研究者認知到機構的公私立性質和大小也會影響安置期間的資源和品質，因此，相關資料也會提供於表 1。

由於符合本研究條件的受訪者尋覓不易，訪談分為兩個時間點進行，第一階段為 105 年 9 月至 12 月；第二階段為 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7 月。

³ 這 3 位分別是小莉、小芽、阿霍。

大部分受訪者只訪談一次，時間約 2 小時，少數進行兩次訪談。訪談主要分三面向：（一）基本資料蒐集，包括受訪者的生活近況，以及所待機構之基本資料（如人力配置、環境概況）；（二）機構管理與教育實踐，涵蓋日常作息、物質資源、制度化的教育活動、教育理念、生活規矩和生涯期待；（三）受訪者的階級情感及相關道德意涵，著重個體對自我的感受和（他人）評價。

二、參與觀察

除了訪談，筆者還曾進入霍爾育幼院進行參與觀察。進入霍爾育幼院前，筆者有先取得受訪者同意，再透過電話聯繫院方，說明筆者曾為服務使用者的身分，表明自己的研究動機和想法，並且提供研究計畫，取得育幼院社工的同意後，方進入機構參與觀察，觀察的時間為 5 小時。當時，筆者除了對機構內的社工、保育主任進行非正式訪談，也正好觀察到某公司進入機構帶領兒少參加團康活動的過程。藉由參與觀察，研究者可檢視育幼院場域、工作人員和兒少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兒少面對工作人員管教的情緒反應等，有助於補充、理解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安置機構	機構性質	安置期間	離院時間	就學	工作現況
小蓁	女	21 歲	彼得育幼院	私立中大型	12-19 歲 (7 年)	2 年	私立科大	家具公司服務人員（建教合作）
阿歡	男	22 歲	威爾育幼院	私立中小型	14-20 歲 (6 年)	2 年	私立科大	早餐店、飲料店工讀
阿賢	男	22 歲	雷諾育幼院	公立大型	7-22 歲 (15 年)	2 月	私立普大 研究所	無

阿志	男	22 歲	雷諾育幼院	公立大型	10-18 歲 (8 年)	4 年	公立二技	幼保人員
小甄	女	23 歲	霍爾育幼院	私立小型	5-19 歲 (14 年)	4 年	私立專科	中央廚房作業員
阿璋	男	23 歲	約翰育幼院	私立中大型	8-22 歲 (14 年)	1 年	私立普大	殯葬業工作者
小莉	女	23 歲	龐貝之家	私立小型	10-15 歲 (5 年)	5 年	私立普大	社工
			比薩之家	公辦民營小型	15-18 歲 (3 年)			
小寧	女	23 歲	霍爾育幼院	私立小型	8-15 歲 (7 年)	8 年	公立科大研究所	便利商店打工
小芽	女	24 歲	阿薩姆之家	私立小型	15-18 歲 (3 年)	6 年	私立普大轉學考到公立普大	科大行政人員
阿霍	男	24 歲	青鳥之家	私立中小型	14-18 歲 (4 年)	6 年	私立普大研究所	網咖服務、工地人力派遣、工廠作業員
阿齊	男	25 歲	貝比諾育幼院	私立中大型	9-18 歲 (9 年)	7 年	私立普大	裝潢工人
阿航	男	25 歲	穆勒育幼院	私立中小型	8-12 歲 (3 年)	7 年	高職畢業	志願役
			艾瑞克之家	私立小型	12 歲 (數月)			
			貝比諾育幼院	私立中大型	12-18 歲 (5 年)			
小芝	女	26 歲	霍爾育幼院	私立小型	8-22 歲 (14 年)	5 年	私立專科	老人機構護理人員

阿賀	男	26 歲	摩西 育幼院	私立 中小型	11-18 歲 (7 年)	8 年	高職同等學歷	臨時工 (工 地 人員 派 遣、發報派 遣)
阿廉	男	35 歲	景泰 育幼院	私立 小型	6-10 歲 (3 年)	16 年	高職 畢業	服飾店員工
			衛斯理 育幼院	私立 中小型	10-17 歲 (6 年)			

* 受訪者的姓名與安置機構名稱皆已經過化名處理。

肆、兒少安置機構的場域規則

本節描述兒少安置機構的場域文化和規則，分成外在物資供給和內在價值灌輸兩個面向探討。

一、層層管制的外在物資供給

隨著兒童福利思潮的發展，兒少安置機構從原本團體式管理逐漸轉變為家庭式經營，因此，現今機構多半將兒少分成若干小家，4 至 10 名兒少配置 1 位保育員或生輔員。保育／生輔員需和院生集體住宿，扮演類「爸媽」的角色。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機構凡安置 6 歲以上兒少，每 6 人需要編制 1 名保育／生輔員，若以 30 人的機構來說，聘用 5 名保育／生輔員已合乎法規，不過法定的聘僱員額僅是規範總額，並未考慮保育／生輔員需要輪休，導致現實狀況往往是同一時段僅有 2 名保育／生輔員在場，也就是 1 位保育／生輔員需照顧 15 名兒少。在人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有效率地管理，機構必須發展出有別於一般家庭的運作方式。

機構日常運作通常由一套規律且重視團體行動的作息表所構成。星期

一到五的上學日，就讀離機構較遠的高中職生 5 點半就得起床，6 點前就需趕搭校車去學校；其餘院生通常也得 6 點起床，自己摺被、盥洗、換上學校制服等待用餐。由宗教團體成立的育幼機構會固定於早晨飯前和晚間睡前安排宗教儀式，並在 7 點半前讓所有孩童到校。放學後，機構會安排院生進行 1 至 2 次打掃。每天晚上都會有固定自習時間，讓院生寫作業並由保育／生輔員檢閱，若有進階的課業需求則會安排大學志工課輔，或者連結專業老師至院內教學，有時也會安排院生到外面補習。週末與寒暑假通常由管理者規劃活動，例如接洽公司組織、慈善團體、大學生安排團康或出遊，有時院生須進行公開表演，遇到傳統節慶則會舉辦應景活動。

在物質資源方面，大部分機構在供應院生的吃穿用度上不虞匱乏，有些環境、設備甚至比一般家庭看來更光鮮亮麗。例如霍爾育幼院是獨棟的四層樓建築物。從大片落地玻璃門進入，寬敞明亮的客廳隨即映入眼簾，32 吋液晶電視、玻璃櫃、偌大的辦公桌，一應俱全。大廚房、用餐區、洗衣場等公共空間窗明几淨。一樓客廳旁便是工作人員辦公室，裡頭擺放數台桌上型電腦，平常除了讓管理者處理公務外，也提供有需求的院生使用；二樓是董事長和院長室，還有幾間設備齊全的客房；三樓有間藏書豐富的閱覽室，擺滿多種玩具的諮商室，以及擺放兩座鋼琴的音樂室；四樓兩間儲藏室，放置善心人士捐贈的各類物資；地下室則為多功能活動中心，有會議室、簡報室、電腦室、撞球間和表演舞台；走進這群兒少的臥房，每戶小家都有冷氣、電風扇，以及廚房、冰箱、衛浴設備，每位院生皆有獨立的床鋪、書桌和衣櫥。此外，機構還會連結許多外界資源，例如：讓孩童學習街舞、繪畫、合唱、小提琴等；由大學社團入院為孩子課後輔導，許多善心人士或機構團體也會捐贈書籍、物資等。

由上述可知，機構的作息固定、物資充裕，在基本生活需求上，的確提供這些失家兒少一個不愁吃穿、穩定度日的地方。然而，這些看似豐富的設備資源、文化貨品，大部分都需經機構管理者、社工或保育／生輔員

的同意才能有條件、限度地提供，院生實際上沒有自由選擇、使用，甚至開口要求的權力。如同小寧所言：「育幼院的資源都是別人捐贈，由大人決定要給誰、怎麼給。」即使院生主動提出自己的需求，但過程中會一直被要求檢討自身行為表現、對育幼院的貢獻程度，甚至得看權威者臉色，阿齊將這個過程形容為：「申請東西就像是跟人談判的過程。」以下分別從衣著打扮、零用金、書籍、3C 用品、才藝學習等面向說明。

在衣著打扮方面，院生的衣服、鞋子有四種來源：一是原生家庭提供，但僅限於有機會返家或家人會定期來院探訪的兒少。沒有家人探訪的兒少大多仰賴第二種來源：善心人士捐贈。當衣服被捐贈到機構時，機構會先將衣物統一收納在倉庫，之後再由管理者分配與挑選衣服。管理者表面上是依照當事人年齡、身材作挑選，實際上院生分配到的服裝已經過篩選，管理者不允許的服裝打扮往往不會有機會出現在院生身上，如小寧被大人囑咐不能穿裙子。

你沒辦法學習怎麼穿搭衣服，而且院裡面太保守，很多衣服你都不能穿，連裙子都不能穿，可是哪個女生小時候不愛漂亮。（小寧）

儘管穿什麼樣式會受到機構限制，但和保育／生輔員互動關係較為良好的院生會有更多機會試穿，並且被分配到較多衣服。第三是院生利用放假時間申請自己的零用錢到外面購買，但申請過程保育／生輔員會針對當事人的花費習慣與生活表現，進行層層評估、檢視。第四種由廠商統一提供，通常出現在公立或大型私立機構。院生可在機構規定的額度（例如兩件長袖、兩件短袖）內自由挑選。若院生不喜歡廠商所提供的款式，想自己到外面買，仍得獲得保育／生輔員許可。

老師那邊要交出的單子就是那個額度，小孩再怎麼想要多，老師也不可能答應，因為他們多寫，也是有可能被上頭退回來……。好比

鞋子你就是不喜歡，想到外面買，那就看老師願不願意讓你去，因為你要去買鞋就得額外花錢，但老師可能覺得說院裡有這些資源，幹嘛還要額外花錢。（阿賢）

對於正值自我認同發展階段的兒少而言，衣著打扮是摸索和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媒介，但院生大部分只能穿經過機構篩選、提供的服飾，非但沒有機會練習穿搭衣服，個人的主觀審美感受也不受到重視。

機構不僅規範院生的衣著打扮，也會管理他們使用零用金的狀況。機構每月會按照年齡提供院生不同金額的零用錢，但是這些零用錢會由機構幫院生存入他們的帳戶，帳簿與印章皆由管理者保管，院生若需用錢得提出申請。申請時，當事人會被要求審慎思考這筆開銷是否為生活必需，並由層層關卡的守門人（如主任、院長、董事長等）逐項檢核花費用途，確認沒問題後才發放。就像阿歡的經驗：隨著申請金額越大，需經過的關卡越多，過程相當繁瑣。

如果是幾百塊的話，就是家老師蓋章、組長蓋章，我就可以拿到。但幾千塊的話，至少要跑一個月，就是要先寫需求單給家老師，然後會計那邊蓋完章，還要跑到社工那邊去看，社工跑完還得要到庭長，院長那邊跑完還要拿到董事長那邊蓋章。（阿歡）

可見，院生雖有零用錢，但沒有自主使用的權利，難有機會學習如何管理、運用金錢；有時，零用金還會成為機構懲處的手段。若院生沒有符合機構規定，就可能被扣零用金。例如小芽每逢生理期衛生紙用量變多，如果在規定期間內提早用完就會被扣錢。

我們衛生紙如果提早用完就會扣錢，可是每個月生理期來用比較多，我曾經因為這個事情跟媽媽（機構生輔員的稱呼）有衝突，有

的媽媽不會體諒你，他們就會說你就是不應該提早用完。（小芽）

在書籍供給方面，有些會分配給院生個人收藏，有些則規劃為公用圖書，但同樣皆由保育／生輔員先揀選適合院生的書籍。其中以對課業學習有幫助的書籍為優先（如參考書籍、評量），再來是能夠增廣孩子見聞的書籍（如十萬個為什麼、星球圖鑑），最後也會擺放休閒書籍（如小說、漫畫），但此類圖書多受到嚴格管理。院生必須在成人認可的時間、空間，以及表現優良，才能有機會閱覽，且孩童不能從院外帶回其他未列管的書籍。為了配合機構作息，孩子很少有時間、空間，自在且大量地閱讀；再者，工作人員因為忙於公務，鮮少有時間陪伴兒少看書；而且機構中的書籍大多為善心人士捐贈，未必符合院生興趣；機構也沒有提供院生購書、選書、討論書籍的機會，於是看似豐富的藏書，最後卻容易出現「擺在那邊好看」（小寧）、「小孩很少看」（阿齊）的結果。

相較於書籍，電子產品（如手機、電腦等）則被多數機構視為違禁品，也就是「容易作怪、很難管理」（小芝）的物品。院生使用電子產品無論是做作業、找資料，抑或聯絡朋友，多會被嚴格控管，包含使用的空間、時間，以及誰可以使用這些產品。例如小寧的寄養媽媽提供她一套必須使用電腦播放的 DVD，原本是作為學習之用，結果因為機構限制院生電腦使用時間，導致她最後沒能看成。

那時候我媽買了一套學數學的 DVD 要給我讀，要你每天用電腦看，結果（育幼院的）電腦根本就沒辦法借，然後還要限制你用電腦的時間，其實就根本沒有用到那套數學 DVD。（小寧）

不僅書籍和電腦等文化貨品被有條件地提供，其他才藝學習和課後輔導等文化資源，表面上看來豐富多樣，事實上同樣難以回應院生需求。機構認為才藝學習可以協助孩子發展多元技能；課業輔導能夠降低他們在學

校學習挫敗、跟不上進度的問題，因而試圖連結校外老師、大學生志工提供才藝學習、課業輔導等文化資源。尤其才藝資源就像阿廉所說：「有很專業的老師、齊全的設備和場地讓我們學習。」然而，阿齊提到院方經常要求院生公開表演才藝，於是才藝演練占滿孩童的假日生活，甚至讓孩子感覺育幼院是一間表演機構。

那時育幼院接了很多活動，都是要我們才藝表演，就變成說以前我們可能六日可以出去打球，但是現在就比較沒有這麼多時間，因為你每天都在忙練舞練舞練舞，才藝表演練舞，然後這個也要表演，那個也要表演，這邊有活動，那邊也有活動，變成你的時間已經分配給所有育幼院的活動。這個地方給人家的感覺像是表演機構，就像明華園那種感覺一樣，就是接 case，然後去表演。（阿齊）

為何院方讓才藝學習演練佔滿院生的假日生活，或許從阿廉的說法可以得到一些解釋。

我學那麼多才藝，真的都是為每一個贊助，什麼愛心團體的公益表演，然後我們就會穿插表演……表演給贊助的人看，但我們表演完就沒有再學了，除非下次又有什麼活動，我們才會再去準備。（阿廉）

院方期望孩子透過才藝表演向社會展現機構正向積極的教養成果，如此更容易連結多元社會資源，院生也能「學習到一技之長」（阿齊），對機構而言，可說是一舉數得。但對兒少來說，學習這些才藝都是短期、被編派的任務，很難成為一技之長，就如阿航所言：「機構讓你學舞，自己以後不一定是舞者。」然而，針對那些院生真正有需求而主動向機構爭取的文化資源，卻往往不被接受，例如：小寧曾向大人提出想到外面補習的要求，卻被以這樣會破壞團體作息的理由拒絕，要求她使用育幼院現有的課

輔資源；殊不知，育幼院的課輔大多是在聊天、陪寫作業，無法真正解決小寧在學業上遇到的困難。

當我跟大人說想要補習時，大人卻要我考慮院裡的作息，而且訓斥我：「只有給我補習那其他人怎麼辦？」叫我不要只是自私地想到自己，並說：「育幼院有安排課輔為何不好好利用？」可是課輔只是陪讀，他沒辦法針對我的弱項，從頭到尾的講一遍，讓我學會。

（小寧）

課輔時間，其實說穿了，他們來只是陪你寫作業，那個時候大家都在聊天，因為平常待在院裡太久了，沒有可以聊天的人，跟外面世界是斷開的，只能從他們身上知道外面世界的資訊、現在流行的東西。

（阿廉）

由上述可知，機構雖然具備兒少日常生活或學習成長所需的各式軟硬體資源，然而，在資源的供給上，卻傾向以機構為中心的安排和管理，對齊一化與集體主義的重視遠大於個人意志和需求，兒少的自決權和表意權受到嚴重限縮；在社會關係上，強調由上而下地權威式監管，服務使用者日復一日地生活在這種權力支配關係和社會控制技術底下，容易將自己作為從屬者的社會關係視為熟悉且理所當然的事情。

二、聽話惜福的內在價值灌輸

除了提供院生日常生活所需的外在物資，機構還很重視品性陶冶與道德教化。只是，相關的價值規範往往聚焦在生活常規的要求上，家務勞動就是典型的例子。機構每天固定安排一到兩次的打掃時間，院生必須將自己負責的居家環境打掃乾淨；寒暑假期間則須從事較粗重的工作（如掃

街、刷洗圍牆等)；或者修理居家用品、協助搬運、整理善心人士捐贈物資等。無可否認，這些家務勞動本來就是機構成員應共同分擔的責任，熟習這些勞動也可以培養他們獨立生活能力，但機構對於勞動成果的要求往往鉅細靡遺。院生為了做到大人期待的好表現，常需耗費許多時間和心力，就像阿賢分享自己洗窗溝的過程：

因為窗溝裡不能有灰，我們通常是窗戶整個拆下來拿去洗，然後拿報紙擦乾，窗溝直接拿水管沖、刷子刷，然後整個窗戶晾乾之後再架上去。那個窗戶就跟透明的一樣，手可以穿過去（笑）。（阿賢）

機構如此強調這些生活細節，背後通常有一套合理化的論述支撐，就如阿齊這樣解釋貝比諾育幼院的立意：

育幼院會希望我們做好現在身分應該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會教我們洗碗、掃地、洗衣服這些事，大人會認為孩子無論未來有沒有成就，我們只要做好每一個生活的小細節就不會被生命擊倒。（阿齊）

耐人尋味的是，貝比諾育幼院將他們對院生家務勞動能力的訓練連結到「做好現在身分應該要作的事情」，可見機構重視的道德價值，不只是一種具普世性的品格教育，還反映他們對於院生身分的特定想像。

機構注重的生活規範和對應的品行，還包括「每餐要把飯菜全部吃完」（小莉）代表惜福；「遇見客人要主動打招呼」（小甄）是因為要有禮貌；「開關門、腳步聲和講話的聲音要小聲」（小芝）代表守秩序；「衣服、碗筷要在時間內洗完」（小寧）是責任感的表現；以及「參加院內安排的活動」（阿瑋）代表合群。這些價值信念不僅透過工作人員經常性地口頭叮嚀，機構內也到處可見相關的標語和海報，寫著禮貌、誠信、合作、惜福、感恩等字樣（田野筆記 20170311）。在眾多的品格涵養中，機構最常提到

的是聽話合群和感恩惜福這兩個價值觀。

（一）聽話合群

前文提到機構在物資供給過程，設有層層管制，此種制度設計授予工作人員極大權力，不容院生有思辨、質疑或展現個性自我的空間；另一方面，機構也會持續透過日常生活教育，讓院生知道乖乖聽話的重要性，就像阿航說的：「大人的建議都要聽、大人就是規則，你最好乖一點。」行為脫序者不僅會遭到管理者責備，還會受到同儕排擠，「那時跟大人吵架，然後其他小孩就會覺得你是異類，反而會攻擊你、霸凌你」（小寧）。院生內心縱使不認同大人的話，或是有自己的好惡，為了順利生存下去，再怎麼不認同、不喜歡還是得乖乖就範。

當下也會覺得老師在講幹話。東西我就吃不下，你要我吃幹嘛！那個衣服、鞋子都不好看，就不想穿啊！什麼感恩惜福！就不喜歡啊！（阿賢）

它廚房就是煮這些，你不管選擇要吃不吃就是這些，然後你可以不吃，應該說你不吃就是沒東西吃了，你就會餓，所以你就是得吃，像是在機構內即便你不喜歡吃你還是得吃。像是早餐，它煮那個綠豆粥，God！那是什麼東西啊？第一次吃就噁～（難吃貌），我是捏著鼻子吃完。即便難吃我還是得吃，因為我的早餐就是那個。（阿賢）

由於院生的各種需求和想法都得經過工作人員的評估和許可，管理者對於院生的生活表現評價，是決定他們能否取得資源的重要關鍵。因此，平常沒有遵守機構生活規範的院生，自然會在其他面向嘗到苦頭。例如，阿航提到自己要考大學，和大人討論適合的科系選擇時，大人卻以阿航

過去的生活表現、學校和育幼院的距離等理由，規範他「不／可以」做什麼。

我原本要讀跟餐飲有關的，但是院長怕我會拿刀子跟別人鬧事，所以就跟院長說我要讀社工或心理系，但學校超過嘉義，院長說不行，那我說我想要買機車，她覺得你會打架鬧事不可以買機車，要坐公車、火車。她覺得你之前會跟人發生衝突，所以不准你做什麼。
（阿航）

同樣地，小寧在機構中經常和管理者意見不合，過得很不愉快，想要請寄養家庭媽媽帶她回家，卻遭到機構人員惡意阻攔。

那時我很想要離開育幼院，然後他們就跟我（寄養家庭）媽說，我表現很差，最後（寄養家庭）媽媽沒有把我帶回去。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有大人跟我（寄養家庭）媽告狀……其實我並沒有表現不好，但卻被他們形容得很壞。（小寧）

小美則是每次想外出都必須先經過機構面談，一方面檢核她的生活表現，二方面重申機構規範。

每次外出都要面談，大人會先看我們的生活表現，例如我常被念內褲沒洗、上課遲到，我們要有改善的誠意，且會有考核表，如果表現低於 60 分，大人就不准那個人出門。（小美）

在這種「大人評價等於資源有無」的情境下，院生們都很清楚遵循機構規定、展現大人眼中的「良好」表現，是他們享有各式權利、資源的談判籌碼，因此，「聽話乖順」、「不要有太多意見、想法」成為他們所有德行陶冶中最重要的一課。

有時，院生並未不聽話或者違反機構規定，只是提出個人化的要求，但機構為了便利管理，就會搬出「合群」作為回絕理由。例如，小寧在升高中的基測前，希望不要出席院內活動，以增加讀書時間，但育幼院以「這是不合群的表現」為理由，拒絕她的申請。

（機構）會覺得那樣很難管理。我當時很想要考一間很好的學校，不想參加院內的活動，但是機構卻嚴厲地教訓我說這是不合群的表現，說因為我是大姊姊要做弟妹的榜樣，還有育幼院的照顧人力不可能讓每一個小孩想幹嘛就幹嘛。（小寧）

又或者像阿歡，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曾為了想在機構找一個練琴的空間，經歷許多辛苦爭取的過程。

我當時時候在一樓客廳彈鋼琴，但鋼琴的後面就是一群人在看電視，所以我彈他們就會覺得很吵，他們就會叫我不吵，我就很難過。我後來就跟老師談。老師一開始也不太會正視我這個問題。後來是換了幾個院長、幾個老師之後，老師也覺得說那不如就讓我去諮商室練琴。（阿歡）

阿廉也提到自己在作生涯選擇時，必須考慮準備升學考試過程會不會影響團體作息，如果會的話，機構可能因此要求他離開這裡。

因為你沒有權力，你的選擇是被育幼院決定的，你要讀什麼你還要考慮育幼院不希望你做什麼，如果你讀的東西會影響到育幼院的作息，他會希望你可以離開，或請親戚帶走，看你親戚有沒有能力負擔。（阿廉）

院生們很清楚「聽話合群」是機構重視的核心價值，因此，如果想要

和管理者協商更多資源，就要持續不斷展現這些行為舉止，才能累積談判籌碼。例如阿航想參加高三畢業旅行，需向法院方申請報名費，但是討論過程，管理者會詢問他在院內有何貢獻，以及未來要如何回饋機構。

有一次想要畢業旅行，自己沒有什麼錢，必須和大人談判。大人問我高中畢業了你要幹嘛、有什麼貢獻？要規劃給他聽，他覺得 OK 才會給你錢。（阿航）

相似地，阿歡是機構裡第一個被允許住學校宿舍的院生，他提到那是因為自己先「犧牲」——表現好，才能獲得想要的東西。

我不可能永遠留在機構裡生活，又想要有個自由，那你必須有個犧牲，你必須要表現好，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阿歡）

阿賢也是他們機構中的模範生，更是第一位被機構核准擁有摩托車的院生。他提到自己從大一就提出申請，但直到大三下表現符合三項評估標準，縣政府主責社工和機構大人才同意。

機車在機構內你要申請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們很多是迫於無奈，機構老師他們不太想要讓我騎車，因為說實在讓我騎車，其他小孩也要。我那時候是在種種條件都吻合的時候才被答應能夠騎車。第一，必要需求——實習。第二，學校在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我猜第三個沒有被講出來的，我自己的表現、自立的程度，老師放不放心我，或甚至是縣政府的主責社工放不放心我。因為我的主責社工比較放心我，他跟我說我有這樣的需要，我要騎車，他都尊重我，所以才從縣政府那裡發文給機構。機構收文後自己評估也覺得 OK，才讓我騎。（阿賢）

因為大人掌握資源有無，以及機構中權威的互動關係，導致院生要爭取資源的過程必須先自我質疑（我最近表現如何、我有資格拿嗎），同時「學會看眼神、臉色」（阿廉、阿瑋），觀察大人的心情好壞，臆測大人可能的想法，以評估自己獲得這項資源的機率。長期以來院生容易養成一種站在機構的立場，思考自身需求的慣習。作為一位「好院生」，要先遵守院內規範，且學會揣摩上意，思考「機構是否有辦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夠接受」（小芝）。換言之，機構要求院生「聽話合群」的背後，存在一種上下、尊卑的關係要素，暗示院生要聽從管理者的想法、不要挑戰管理者權威、要會看大人臉色，無意間可能會讓服務使用者內化自己的需求和想法是不重要的，沒有人會認真看待或傾聽自己的需求，自己不值得、沒有權利獲得想要的東西（Reay, 2005: 916-917）。

（二）感恩惜福

兒少一旦住進機構，不僅要熟習、遵循團體規範，還會經常被提醒要感恩惜福。無論張貼於牆面或布告欄的醒目標語，或是日常生活互動，工作人員都會耳提面命地再三叮嚀：機構所擁有的人力物資都是社會大眾慈善積累的結果，感恩是院生的本分，更是一種使命。筆者在民間團體工作，曾經帶領機構兒少充權團體，有位來自公立機構的服務使用者分享：「大人會告訴我們，我們是來這裡管理你、照顧你、保護你的，你就應該要感恩！」來自公立機構的阿志也提到，機構常告訴他們：「不要浪費國家資源。」成長於私立機構的阿歡憶起院長經常叮囑，院生的日常所用都是納稅人捐助，要珍惜與感恩。

你知道你身上穿的吃的用的，你現在所待的這個機構是我們納稅人的錢，要感恩、不要浪費。（阿歡）

無可否認，感恩、惜福、知足都是很正向的美德和價值觀。然而，進一步深究卻可發現，機構時時告誡院生懂得感恩其實是在提醒他們，正處於社會中的異常位置，其日常生活互動或態度應符合被救助的正當性，否則就失去福利資格，可說是一種經過粉飾的福利烙印（唐文慧、張婷莞，2011）。

面對這種福利烙印，有人會正面回應，將知足感恩內化為自己的人生價值，有機會就想幫助別人、回饋社會，例如小莉：

我在育幼院只要一千塊可以從頭到腳買齊，我都是去菜市場、不會去追求牌子……。我們會在聖誕節親手做卡片給幫助過我們的人，或去慈善會參加尾牙、獻詩獻唱，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回報的，只要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就是最大的回報。（小莉）

有人卻因此內化劣等感，認為自己「不該要求太多」，「以自己的身分而言，能夠擁有現在這些東西就應該滿足了」，就像阿廉所說：

原來我想要學的東西都是有錢人才可以學的，這是他們灌輸我的。他們三年來就一直灌輸我不要念這個不要念那個，應該是覺得我不適合念那個，或者說環境不許可，我不應該有這些東西。（阿廉）

從阿廉的說法，我們更可確定：感恩惜福只是經過美化的說法，機構真正要傳遞的其實是階級認份的價值觀，用來暗示院生應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命運，不該有多餘的妄想和追求。在勞動市場中，此種「認份」的觀點，通常出現在勞工階級身上，其意識型態效果不僅建構勞工對自己的看法，也建構勞工與管理人員或雇主的關係，是不平等勞資關係得以維繫的重要心理機制（謝國雄，1994：96-97）。這恰好反映了機構對於院生的階級未來想像。

無論升學、考證照、找工作，機構多半鼓勵院生朝向容易就業的技職類科發展，因為希望他們儘快自立生活，「不要成為社會的負擔」（小芝、阿志）。因此，討論過程院方和當事人看似有進行雙向溝通，實際上，經常是由機構單向導引院生朝機構認可的生涯路徑作選擇。而且機構認可的途徑，大多是因為無須提供額外資源、又符合機構本身利益，並非從院生本身的興趣、才能作考量。例如阿齊待過的貝比諾育幼院因為有在賣麵包，所以希望他念技職學校，考取烘焙證照或者技職類證照，甚至要他選擇離機構較近的學校，方便日後回到機構幫忙帶小孩。

我們升大學會和大人討論，但我覺得這都有點表象，因為他們說要跟你討論，但是他們其實都已經把結果想好了，有的人想要去讀北部的學校（離開南部的育幼院），院長會想盡辦法引導院生到育幼院想要他們讀的學校，就離育幼院近的學校，希望你常常回育幼院幫忙帶小孩。（阿齊）

如果院生想要學習的技藝，太過昂貴或缺乏立即經濟效益很容易被打回票。就像阿廉很早就發現自己對於藝術美學有濃厚興趣，但因為就讀這類學科會產生許多額外花費，院方表面上為他評估未來出路的風險，實際上希望「勸退」他這個念頭。

我那時想讀美工科，但是育幼院說：「讀這個太貴，而且也沒有人會幫你負擔那筆錢，然後你打工也應該付不出那筆錢，男生讀美工沒有用，你出去也用不到美工。你不如去讀餐飲科，可以去當廚師。」可是我其實不喜歡餐飲科。之後我就說我想讀流行服裝科，他們也說太貴了不行，他們覺得我的狀況不適合讀，所以叫我不讀，然後我就乖乖聽了。（阿廉）

就算院生堅持選擇個人的夢想和抱負，他們深知「育幼院的資源有限，通常僅能精神上的支持」（阿齊）。例如小寧曾想當個設計師，但育幼院大人給予的回應卻令她備感挫折。

你說想要當個設計師，大人就會說：「好呀，可是現在設計師沒錢耶！沒工作耶！你要磨耶！你肯努力嗎？」他就這樣質問你。他不會告訴你：「設計師不錯啊！那你現在要怎麼去進修，那我這邊有個建議……」他不會一開始就以鼓勵的方式，而是一開始就直接先唱衰你，那兩個感覺是不一樣的，你聽到第一個，他在貶低我；另一個是，「他有在支持我，他有在為我想。」（小寧）

由上述可知，機構面對院生的夢想時，往往預設孩子的（受救助者）「身分」等於能力低下、自我控制力不足、機會資源不足、成功可能性低……等，因此期待他們看清自己的「侷限」，儘快習得一技之長，成為基層勞動力，而非按照孩子個別的性情、才能、興趣協助他們自主規劃。在這過程中，感恩惜福、知足常樂就成為一種很好的規勸論述，讓院生安於選擇此種低風險、低成本、又可維持個人基本生活條件的一條路。

經本節檢視場域規則可知，兒少安置機構固然提供院生比起原生家庭更為豐富的物質生活和文化資源，讓孩童能在穩定環境中成長，但是無論書籍、電子產品、才藝學習、課業輔導等文化財貨的進用，都存在層層管控機制。管理者透過審查、核可院生要求、形成一種具高度權力位階的主導者，院生在這些固定、日常的運作模式中學到：不該有自己的想法、凡事應優先考量機構立場、要會看大人臉色、聽話合群、不該要求太多，可以像現在這樣就該感恩惜福了。而這些場域規則日復一日、內外交織，共同灌注、銘刻於院生的身心感知中，如何形塑他們的慣習，並且影響這群兒少的階級未來，此乃下節欲探究的重點。

伍、服務使用者慣習及其階級效應

本節依慣習的智性和情感面向，分成「平凡就好的階級認知與效應」和「階級恥感及其效應」兩個段落，討論特定慣習的內涵及其階級作用力。

一、平凡就好的階級認知與效應

（一）平凡就好的生涯圖像

學校是階級爬升的重要機構（Calarco, 2014; Lareau, 2003; Reay, 2017），然而，大部分院生和學校這個正式機構的互動經驗都比較負面，受訪者也發現「機構的孩子好像都不喜歡讀書」（小莉、阿瑋、小芽）。他們的自我歸因如下：一、機構缺乏讀書風氣。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在機構裡缺少可以獨自安靜念書的環境，他們必須配合團體作息，導致讀書時間被切成塊狀，還會因為周遭同儕的活動而影響讀書風氣和動機。因此，在讀書考試方面經常經歷挫敗、缺乏成功經驗，久而久之就失去學習動機。二、由於機構的生活控制嚴密，缺乏自主性，學校對他們的意義變成是一個可以暫時脫離機構管教，以及拓展人際關係的自由空間。有些院生會將機構裡積壓的情緒帶到學校排解，或者把在育幼院無法滿足（被壓抑）的欲望（如想吃零食、玩電腦遊戲和騎腳踏車等）留到學校這個相對自由的場域嘗試實踐，因此容易遭受老師斥責和負面評價。三、機構重視院生在學校的行為表現勝於課業成就。機構基本上尊重學校政策和老師的想法，並不會積極介入學校老師對於院生的教育方法，除非院生在學校做錯事情，諸如蹺課、偷竊、打架，回到機構才會受到訓斥和懲罰，否則院生只要安分地上學，機構不會將孩子的課業成績與突出表現當成栽培重點。此外，準備高中職和大學考試的過程，機構大人很少跟院生討論他們的夢想、如何規劃

人生方向、評估高中職優劣、大學環境，以及目前就業趨勢等，因此，面對生涯抉擇，他們很「自然地」傾向遵循年長院生走過的路——就讀技職類科，至少有前人的經驗、朋友的陪伴，可以降低無法預料的風險。例如小甄高職選擇餐飲科，原因就是院內哥哥姊姊多選擇這一類科。上述多種背景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使得他們在國中升高中的階段，一方面自覺無力面對沉重的智育考試壓力，一方面則是想要儘快習得「一技之長」（阿賢），以便儘早獨立謀生，最後往往「自願性地選擇」就讀高職或專科。

對於人生未來的藍圖，他們也沒有熱切的想望或追求，不少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人生只要「平凡就好」。

我沒有想要什麼成就、賺什麼大錢、特別想做的事，我只要吃飽睡飽、顧好自己的女友，平凡過日子就好。（阿齊）

我覺得小時候這麼苦過，至少長大比小時候好過，不應該再繼續貪心，我會覺得平凡簡單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然後也是因為自己嚐過小確幸之後，就不太敢讓自己冒險、嘗試，導致我自己一直停留在原地，沒辦法往上，當然也沒有辦法讓自己往下。（阿廉）

無疑地，「平凡就好」是多條人生道路的選擇之一，研究者無意評價任何一種生涯選擇的優劣，然而，值得探究的是，為何機構出身的青年會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的人生只要平凡就好？要回答這個問題，機構作為他們長期生活、成長的社會場域，影響力不容忽視。正如阿齊所說：

育幼院感覺會輸入一等，待在育幼院，侷限在那個框架，像尚未孵化的蛋，所有的東西（包括欲望、自我）都被壓在那個空間裡面。（阿齊）

住在機構長達9年的阿齊，深感育幼院是一個壓抑自我的環境，難以

發展個人的獨特性與創造性。事實上，這和場域的文化規則有關。前節曾提及機構因人力物資有限，只好採團體化的管理方式，外部物資供給須經評估管控，內部道德教化強調聽話順從、感恩惜福，長久下來，容易養成院生習於壓抑欲望／想法、照章行事的生存慣習，無怪乎他們對於人生的想望多是「平凡就好」，因為這正是機構透過正式、非正式的教養機制所形塑而成的秉性慣習。

（二）客觀階級位置

檢視受訪者目前的客觀階級位置，可以發現此種受到社會結構影響形塑而成的自我（階級）認知和慣習，的確在服務使用者的階級爬升過程扮演一定角色。以教育程度來說，15 名受訪者中，僅有 3 位讀到研究所，雖有 7 位擁有大學學歷，但大部分集中於私立大學，其餘 5 位則畢業自私立的專科與高職（見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以職業來說，有讀研究所的小寧、阿賢、阿霍，目前都還在就學中，以半工半讀的方式維持生活；大學和高職專科學歷者，職業以體力勞動（志願役、裝潢工人、廚房作業員）、服務業（殯葬業、家具店、餐飲店、服飾店員工、幼保人員、社工、護理人員）、行政職員為主，月薪集中在 2 萬至 3 萬 5,000 元之間。其中處境比較艱辛的是阿賢，目前在當臨時工，工作呈現高度不穩定，若遇到非預期的風險，就極有可能落入貧窮循環。

二、階級恥感及其效應

（一）羞恥感與自我咎責

Sayer（2005）指出羞恥不只是一種情感形式，更是一種關於人們如何被對待的評價性判斷，通常和階級有關。對機構的服務使用者來說，

「感到羞恥」、「自我輕蔑」是非常普遍的情感慣習，這和他們的安置經驗脫不了干係。下面將從審美、能力、道德和內化他人蔑視這幾個面向呈現服務使用者的恥感經驗，及其和場域規則的關聯，最後說明羞恥感所引發的自省和自責，如何長期影響他們的自我價值感，造成特定階級效應。

在審美面向，如前節所述，院生的服裝打扮都是由機構保育／生輔員決定，院生缺乏自主選擇、練習穿搭的資源與機會，因此即使離院後享有穿搭自主權，仍會覺得自己穿著打扮不得體／不入流。面對同儕團體和特定正式場合，常有尷尬丟臉的感覺，認為自己無法融入團體，或者不應待在那些「不屬於」自己的場所。例如小寧在剛離院的那段時間，因為不知道如何穿搭衣服，而自覺無法融入同儕團體；阿航不敢去餐廳或者美容院，總覺得這些場所太過「高級」，不是自己該來的地方。

我剛離院那段時間，不知道怎麼穿搭衣服，別人總是知道要配什麼顏色、樣式的衣服才好看，我穿的衣服卻很土，常覺得很丟臉，而這很大程度也影響到我跟朋友或同學的相處，會覺得無法融入。

（小寧）

我不敢去餐廳，因為不習慣，經過餐廳常自己摸摸鼻子離開，感覺會有很多無形的眼睛在看我，會不會覺得我穿得很奇怪，路邊攤比較適合我。我也沒辦法去大型的連鎖美容院，感覺那裡太高級，自己會壓力很大，覺得很不好意思。（阿航）

由此可見，審美引發的恥感不僅影響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同時也形塑他們進入特定場所、人際互動、團體參與的意願和機會。

在能力表現方面，如同 Reay（2005）研究的工人階級學生，離院青年傾向過度低估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一定無法達成他人或自己的期待，因此容易中途放棄，同時為此內疚、自責。例如阿瑋在學習語言專業的過

程中，常質疑自己不夠積極、只有三分鐘熱度。

我想要讓自己的專業更好、想要學語言，但是總覺得自己不夠積極，做什麼事情只有三分鐘的熱度……現階段的障礙永遠都是在我自己身上，就自己沒有動力，沒有持續，這一切都是自己的問題。
(阿瑋)

阿廉對美感藝術有著強烈興趣，很想出國深造，雖然很清楚出國需要充裕的資本支持，並非他個人能力問題，但他還是會責怪自己動力不足。

我覺得責任歸屬有一半要怪自己，我總是沒有動力，也沒有那個環境去支持我完成這個想法。(阿廉)

阿賢找工作時，常因沒有大學文憑而受挫，雖然阿賢沒上大學和機構的環境、氛圍有關，但他卻習慣將失敗的原因全部歸咎到自己身上，責備自己過去為何不好好努力考大學。

就我去面試後，很多公司常常說等通知，結果卻一直沒有通知，但是其他有上大學的人卻很快就能錄取。一開始覺得自己能力並沒有不好，搞不好可以比那些大學生表現好，但是因為有太多工作很看重學歷，自己只有高職同等學歷，很難找到比較好的工作。每當我面試完後，我就會感到後悔：當時候為何沒有好好念書，把高中讀完、考大學，現在就不會這個樣子了，我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的問題。(阿賢)

阿賢還提到自己每做一份工作一段時間就會覺得倦怠，很想要跟朋友到處去玩，所以工作換了一份又一份，他將這些境遇歸因為自己不夠努力，太容易受外在環境誘惑。可見，儘管離院青年的境遇和前節所談的機

構環境脫不了關係，但他們在虛假的平等意識教育下，往往容易將自身的能力表現解釋為個人努力不足的產物（Reay, 2005; Sayer, 2005），因此，對自我能力表現的羞愧容易引發自責，以及自我問題歸因，並且產生低自我價值感的惡性循環。

此外，離院青年與他人互動時，對於自己的行為模式是否符合人們所認為適當的標準始終保持高度的敏感，他們會反覆審視自己有沒有做出能被所屬團體肯認的得體行為，如果沒有做到就會感到羞恥，甚至出現罪惡感。例如阿齊上大學的時候常覺得自己講話容易冷場，無法融入班級群體，因此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阿廉常擔心自己的行為會否招致身旁朋友不悅，如果人際關係生變都會先自我究責。

我從小習慣問自己：是不是因為我怎麼樣，才會造成別人怎麼樣，即便對方可能也沒有這麼想，但是自己就會揣測，會不會是因為我這樣，才導致……像以前朋友邀我出去，即使我可能不想去，或者別人請我吃東西，可能我不見得想吃，但我就會說：好，去啊！還不錯吃，我不希望因為自己而破壞跟他們的關係，如果這樣的話，內心就會有罪惡感。（阿廉）

阿廉並非特例，不少離院青年提到自己與人互動時習慣拿外在標準反覆檢視自身的言行舉止，如果關係出現問題，通常會將問題歸因在自己身上。雖然對人際關係具有高度反思性，確實可能促成關係的延續與改善，但也容易使個人經常處於侷促不安的狀態，甚至因為害怕與擔心，而無法自在地與人相處，進而做出如同阿齊的選擇：一個人獨來獨往，不利社會資本的積累。

最後，離院青年容易將他人對特定階級身分的蔑視，內化成自己的問題，並為此感到羞恥。雖然個體所處階級多是承襲而來，無關乎個人特質，

然而，過往曾經被嘲笑或錯待的經驗，使得他們學會內化社會污名，對育幼院的出身感到羞恥，必須小心翼翼地隱藏。例如阿賢總是擔心育幼院身分曝光後，可能會被周遭的人嘲笑或無法被女友及其家人接納。

我很在乎育幼院這個身分，怕被別人嘲笑，說我是個沒有父母的小孩，我在乎別人侮辱我的家人，我在乎被別人看不起。我之前不想去上學就是因為被同學嘲笑、諷刺、侮辱。很擔心自己的身分曝光。就像自己之前交女朋友，我都不會透露自己的身分，會擔心女朋友可憐我，她的家人沒辦法接受我，我心裡會有陰影。（阿賢）

阿廉曾因為擔心免繳營養午餐費用會使身分曝光，於是向老師要求付費訂便當，不敢行使自己應有的權益，在跟同學互動的過程更常為此感到懼怕、自卑。

那時營養午餐因為我住育幼院可以不用錢，被同學發現，他們就會問我為什麼可以不用錢，我後來就不敢吃了，我就跟老師說我可以付錢訂便當。我不想告訴別人我住育幼院，不想和其他院生走在一起，因為覺得丟臉。跟別人吵架時，別人會說你是孤兒，說你沒有爸爸媽媽，然後問你很多事情。可是小時候很不想回答，就會很懼怕、很自卑。（阿廉）

綜上所述，階級的恥感銘刻在主觀審美、能力表現、倫理道德、內化他人蔑視等社會過程中，使得離院青年經常活在一種低自我價值的心理狀態下，彷彿是靈魂的罪（Kuhn, 1995；Sayer, 2005；Walkerdine, Lucey, & Melody, 2001）。他們還會不斷地拿那些多數人尊崇（如，「完整健全」的家庭），也是他們無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和標準來評量自己的言行舉止，抑或縱然已獲得多數人肯認，仍會經常性地自我檢視，並為「不夠格、不匹

配」的自己感到羞恥，長期下來，個體的自尊自信會遭受嚴重挫傷，更難有機會過著一種有尊嚴和價值感的生活，同時也可能使他們養成退縮卑怯的生存心態，自我隔離於渴望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之外。

（二）「我過得很好」：反抗的兩種路徑

透過羞恥感，人們會內化社會期待、規範和理想，並且自我規訓甚至懲罰，然而羞恥感不只生產社會順從，有時也會引發反抗（Skeggs, 1997; Willis, 2017）。有些離院青年為了抵抗強烈的恥感，會刻意武裝自己，對外營造一種「我過得很好」的意象，儘管事實完全不然。

我有一度真的沒錢吃飯的時候，向親戚開口拿錢過。那時真的非常難開口，我拉不下臉，因為感覺是一種羞恥……我希望讓大家看到我比較好的一面，不要讓大家覺得說我過得不好，我只是想讓他們知道，我不用靠你，我也可以過得很好。可是其實上，我那時候真的很辛苦。（阿廉）

很明顯地，當阿廉說：「我過得很好。」並非真的過得很好，而是一種想向外人證明自己有能力扭轉現實困境，期望給人正面形象的心理機制。為了保有僅存的尊嚴，許多受訪者都有這種故作堅強的經驗。

當院裡問我過得怎樣，我就會說我很好啊，還不錯啊！但其實自己過得沒那麼好，這應該算是善意的謊言吧！不想讓別人為我擔心，不想別人可憐我。我會盡力地偽裝自己……（阿貿）

事實上，阿貿曾經有兩年時間在街上流浪，每天僅吃泡麵過活，口渴就到附近圖書館喝免費飲用水，最後不得已鼓起勇氣向舅舅和朋友借錢才度過難關。儘管遭遇這麼艱難的處境，他回觀當時情況仍自責地說：「我

應該靠自己，不應該求別人幫忙。」可見，「我過得很好」很多時候只是一種武裝，用來維護他們脆弱的自我價值和尊嚴，然而，這也使得他們遇到困難習慣自己默默承擔，不對外求助，因此容易失去獲得奧援的機會（Jack, 2016; Lareau, 2015），就如同阿廉所說：「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悶著頭做，有任何情緒也都往自己吞。」遇到困境時，不敢奢求別人的幫助，認為「我只能靠自己解決」。

相反地，有時候「我過得很好」也可能是一種正向、自我肯認的真實表述。為了對抗外界對於機構服務使用者的污名，有些離院青年嚴格地自我督促、極力爭取向上爬升的機會，將原先覺得自己不如人的恥感，化為努力向上的動力，使得他們如今可以自信地說出「我過得很好」這句話。

每次回到育幼院我都會告訴他們我過得很好，我有參加什麼活動、學習到什麼，想向他們表達感謝，我不希望自己過得不好讓他們擔心，我也想向他們證明我可以靠自己努力變得跟以前不一樣。（小甄）

阿廉坦言由於過怕了育幼院的日子，這種亟欲脫離貧窮的心態，反而造就他奮發向上的動力。

我因為念私立高職，院裡不能提供學費，要我們自己出去打工，所以我很早就接觸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生活樣貌，那時我就想要融入，而且我很愛漂亮，想要買衣服，我一定要吃東西，因為在育幼院有餓過，我餓怕了。我想要賺更多的錢，把書趕快念完，然後過好一點的生活。好一點的生活就是有自己的空間、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學自己想學的東西，我要的很簡單吧！我只是不想被別人擺布、被別人安排。（阿廉）

阿廉從高職起就開始打工接觸外面的世界，從此開啟他的視野，認識

到什麼叫「好一點的生活」，因此造就他想要改變現狀、向上爬升的強烈動機。經過持續不斷地自我督促和刻苦自勵，他順利完成高職學業、考取證照，得以過著心中長期想望的「好一點的生活」。

我那時候告訴自己，這個社會學歷低是很難生存的，可是我又要面對現實面，可能沒辦法繼續升大學，所以我跟我自己說，無論如何先把高職念完，有什麼夢想以後再想。……我很努力硬拚地把高職三年念完、順利考到證照。我如果沒有把這高職三年念完，我以後得到的會更少，然後會被人家瞧不起。而且當時我遇到一個狀況是，誰也不會給我錢，我就覺得自己一定要賺很多錢，因為那些錢才能有辦法維持我的生活。（阿廉）

阿瑋也強調：「當你不能改變環境，那就只能改變你自己。」就像小芽曾抱怨在安置機構很難專心讀書，且由於國小時成績不差，15歲才住進機構的她深感自己的能力絕不僅止於此，因而離院後便決定每天按時念書，想放棄時就上網搜尋考上國立大學的學生所分享的經驗與激勵人心之話語，例如：「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鬧鐘而是夢想。」最終如願以償，把握轉學考契機，進入國立大學。

當時的我覺得自己很失敗，只能讀私立大學，心裡有不服輸的感覺，讓我覺得自己一定要讀國立大學，然後我會覺得自己是因為曾經被家暴又住進機構，沒辦法再往上爬，就讓我覺得自己一定要跨過去。不管怎樣我就是要考上國立大學。（小芽）

現在的她會以「你的不幸將成為你戰勝未來的武器」激勵安置機構的服務使用者不要輕易放棄。同樣地，不少離院青年也認為育幼院的辛苦經驗，培育了他們許多正面的特質與自我期許，例如：「我們都很獨立、成

熟」(小莉、阿航)、「我們能夠比一般人想得更多」(阿齊)、「我會想要回饋社會」(小甄)、「你自己要有積極行動」(小芝)、「只有更努力才會成功」(阿瑋、阿賢)。可見自覺不足、羞恥的情感經驗也可能帶來正面的抵抗力量，使得人們因此得以發展茁壯。

陸、結論與建議

機構安置服務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的最後一道防線(胡中宜、彭淑華, 2013)。然而，本研究透過「慣習」概念，採社會心理取徑分析兒少安置機構(場域)、服務使用者慣習，以及離院後階級效應三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機構青年離院後的不利社會處境與安置經驗有很大的關聯。田野資料分兩部分呈現，一為兒少安置機構的場域規則；二為服務使用者慣習及其階級效應。

在場域規則的部分，本研究發現機構儘管看似提供服務使用者一個穩定作息、資源豐沛的環境，但由於院生在各式資源的進用和取得上，都受到重重管制，影響所及，院生很容易養成看大人臉色、優先考量機構立場的心性，甚至認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都是不重要的；同時機構教養強調聽話順從、合群、感恩惜福等品性的培養，雖然有其名目上的正當性和便利管理等實際考量，然而無形中可能壓抑兒少的個性化發展，強化他們順服、低自我期待、習於選擇最小風險／報酬的行事邏輯。

在服務使用者慣習及其階級效應，我們發現經過上述場域文化長期形塑與陶冶的結果，離院青年生產出兩個與當下階級處境相關的慣習，一為平凡就好的生涯圖像。受到機構各種有形無形的影響，他們普遍認為自己不愛讀書、也不會讀書，在教育文憑的取得上缺乏動力，因此能念到研究所的實屬少數，大部分人在取得私立大學或私立高職專科文憑即進入職

場；在工作位階和屬性上，多半從事和體力勞動、服務業或行政職員等基層工作，月薪大約在 2 萬到 3 萬 5,000 元上下，也有人工作型態呈現高度不穩定，極可能落入貧窮的循環。二為羞恥感與自我咎責，服務使用者在機構中長期地被管束，缺乏自主自決的成功經驗，加上機構工作人員或其他社會大眾與他們互動時，可能抱持福利烙印的刻板印象（唐文慧、張婷堯，2011），使得他們容易內化低自我價值感與相關的道德評價。因此，感到羞恥、自覺低人一等、自我咎責等負向階級情感，經常如影隨形地伴著他們成長，造成隱性的階級傷害。服務使用者回應此種階級情感的途徑有負面也有正面，導致再製與抗拒交織的階級效應。就負面而言，有些青年為遮掩恥感，他們會用「我過得很好」來自我武裝，即使遇到困難也不願求助，將遭逢的困境解讀為自己的問題，因此讓自己陷入更孤立無援的境地；就正面來說，有些青年傾向將逆境化為向上動力，因此他們也會說「我過得很好」，然而，與前者不同之處在於，此時「我過得很好」是一種真誠、自我肯認的正向表述，除了有自我鼓勵、培力的作用外，他們也希望透過自己的例子砥礪其他服務使用者，鼓勵他們發揮優勢觀點，讓生命中的阻力變成助力。整體而言，此兩種智性與情感慣習帶來的階級效應，抗拒與再製兼而有之，但仍以再製為主要基調，包括離院青年多從事勞工階級職業，少有晉身專業中產階級的案例；在心理上，大多長期處於低自我評價、感到羞恥的狀態。

兒少安置機構為國家提供弱勢兒少保護的福利服務，其目標在促進服務使用者身心健全發展，然而，本文中呈現的安置機構非但無法培力服務使用者，反而造成他們的侷限，顯示機構雖有良善立意，但在實質操作上，可能疏忽了某些重要的面向才會導致相反的結果。Sayer（2005: 56）指出：「發展自我價值感，需要主體之間相互的肯認，兩造雙方都有清楚的平等感，可以自由地行使自主權。」這段話呼應了當前國際公約中籲求落實兒少表意權的潮流。根據 1989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規範：「國

家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對於受機構安置保護的兒童而言，兒童表意權意味著這些處於受國家保護或救助之福利體系中的兒少，不應只是被動接受保護的福利客體，而是有權於國家所發動之程序中，就其處境表達意見的「權利主體」（林沛君，2017）。對照到本研究中這些兒少安置機構的場域文化和規則，這意味著機構中若有類似的有形管制機制或無形的聽話順從等文化價值，都有重新思考、檢討的必要。

有鑑於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一、機構設置法規和評鑑辦法必須保障住民可以平等且自由地參與跟自身權益有關的決策過程，不僅在「形式上」設計參與的機制（如家庭會議），還得讓兒少有機會為自己想過的生活提意見、獲回應及做決定。就如同台灣障礙運動的訴求：「沒有住民的參與，不該替住民做決定。」（周月清，2017；Chou & Schalock, 2007）機構應讓服務使用者充分參與跟自身權益有關的決策過程，不能以「教養」之名行「幼稚化」之實，或是為了便於管理，犧牲兒少的基本人權。二、機構的教養方式應以「充權」模式取代「權威管理」模式，培育服務使用者獲得掌控與自身相關事務的力量，以提升個人身心健康與組織生活品質。換言之，機構必須協助服務使用者越來越有能力做決定及處理生活的事務，進而使其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而能自己去解決，才能真正使服務使用者掌握自己的生活，並且擁有實際控制、權力的感受（張銀旭，2014：20-21）。三、政府應積極改善機構普遍存在人力不足的問題。兒少安置機構之所以會發展出全控管理的教養模式，和其緊縮的人力資源有關。政府可以透過調查研究，瞭解實際人力需求，修改相關法規，同時調高保育／生輔員薪資。特別是台灣有許多兒少機構位於偏鄉、交通物資缺乏的地帶，本就難以招才，再加上吃重的照顧工作，容易使工作人員產生職業倦怠而紛紛離職，影響兒少建立穩定依附關係。若能提高第一線專

業照顧者的基本薪資，並且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那麼不僅有助招聘，還能改善兒少照顧品質。

最後，我們必須承認本研究存在許多限制。首先，本文所呈現的機構樣貌只根據受訪者待過的 15 家機構，因此，本研究發現並非通則，不能推論到國內所有的兒少安置機構型態；再者，本研究訪談資料來自服務使用者回顧多年前所待過的機構狀態，或許對於部分機構來說，如今現狀已有大幅改善，這種因時間差產生的變化確實可能存在。最後，因每位受訪者被安置的時間長短、生命歷程（幼年、兒童、青少年等）、人格特質、離院時間都有差異，作為一份初探性的質性研究，現實上無法涵蓋所有可能變項，所以在階級效應的解釋上，可能有不夠周全之處，這些都是本研究的限制。然而，基於改善被安置兒少處境、提升其福祉的立場，我們期待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特定的人口性質類屬，作更深入的質性研究；或是進行長期追蹤研究，將受訪者的離院時間再拉長一點，以瞭解特定型態的安置方式對當事人身心狀態的長期影響。期待透過未來更多相關研究的努力，可以為接受安置的兒少制訂更完善的福利服務，提供更具有品質的照顧方式。

參考文獻

-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2007）。〈96 年育幼院院生離院與就學、就業情況調查分析報告〉。未出版。
- 【Chinese Childrenhome & Shelter Association. (2007).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chooling and employ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who leave residential placement in 2007.*】
- 白倩如（2012）。〈機構安置少女復原力培育之行動研究〉，《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5，103-155。doi: 10.6171/ntuswr2012.25.03
- 【Pai, C.-J. (2012). Action research of cultivating resilience of teenage girls in a residential setting. *NTU Social Work Review*, 25, 103-155. doi: 10.6171/ntuswr2012.25.03】
- 余姍瑾（2011）。《安置機構「家」的意義建構：歷經長期機構安置之離院個案的經驗詮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Yu, S.-C. (2011). *The meaning of "home":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are leavers toward their residential placem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吳惠文、許雅惠（2015）。〈「家」內鬨牆——兒少安置機構專業人員之專業互動分析〉，《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9，25-51。
- 【Wu, H.-W., & Sheu, Y.-H. (2015). "Family" fus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professionals in residential care for youth. *Soocho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9, 25-51.】
- 周新富（2005）。《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台北：心理。
- 【Jou, S.-F. (2005). *Bourdieu on schoo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Taipei, Taiwan: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周月清（2017）。〈去機構教養化與解放研究：身心障礙者服務及障礙研究〉，《臺灣社會學會通訊》，87，11-20。
- 【Chou, Y.-C. (2017).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mancipatory research: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disability studies. *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mmunication*, 87, 11-20.】
- 林沛君（2017）。〈兒少「表意權」實質意涵的初探——以被安置兒少發聲的

- 權利為中心》，《台灣人權學刊》，4(1)，73-96。
- 【Lin, P. P.-C. (2017).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 A rights-based approach for children in child protective proceedings. *Taiwan Human Rights Journal*, 4(1), 73-96.】
-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 【Ciou, T.-C. (2002).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aipei, Taiwan: Laureate.】
- 胡中宜（2010）。〈離院少年自立生活準備的服務內涵與標準〉，《青年研究學報》，13(1)，179-189。
- 【Hu, C.-Y. (2010). The service content and standards of independent living preparation for young people leaving out-of-home c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3(1), 179-189.】
- 胡中宜（2011）。〈台灣離院青少年自立生活轉銜服務之發展與評析〉，《青年研究學報》，14(2)，143-153。
- 【Hu, C.-Y. (2011). The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living transition for young people leaving out-of-home c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4(2), 143-153.】
- 胡中宜（2014）。〈離院青年自立生活之優勢經驗：社會工作者的觀點〉，《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0，45-90。doi: 10.6171/ntuswr2014.30.02
- 【Hu, C.-Y. (2014). Exploring young people's strengths of independent living experiences after leaving out-of-home care: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workers. *NTU Social Work Review*, 30, 45-90. doi: 10.6171/ntuswr2014.30.02】
- 胡中宜、彭淑華（2013）。〈離開安置機構青年之自立生活現況與相關經驗初探〉，《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1，49-80。
- 【Hu, C.-Y., & Pong, S.-H. (2013). Exploring young people's independent living experiences after leaving residential care. *Taiwanese Social Work*, 11, 49-80.】
- 唐文慧、張婷莞（2011）。〈積極性社會救助方案與福利烙印〉，《社區發展季刊》，135，379-398。
- 【Tang, W.-H., & Chang, T.-K. (2011). Welfare stigma and social assistance: The case of hope proje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35, 379-398.】
- 翁毓秀（2011）。〈臺灣地區兒童少年安置照顧的發展與未來〉，《社區發展季刊》，133，294-308。

- 【Weng, Y.-S. (2011). Residential child care in Taiwan—Development and perspect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33, 294-308.】
- 張紉 (2000)。〈青少年安置服務福利屬性之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191-215。doi: 10.6171/ntuswr2000.02.05
- 【Chang, R. (2000). An exploration on the youth residential service. *NTU Social Work Review*, 2, 191-215. doi: 10.6171/ntuswr2000.02.05】
- 張銀旭 (2014 年 6 月)。〈台灣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現況與未來發展〉。「兩岸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劇變時代的社會福利政策」，台北。
- 【Chang, Y.-H. (2014, Ju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ld and youth residential placement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al Welfare Symposium of Both Side Across the Strait: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Time of Transformation, Taipei, Taiwan.】
- 陳怡芳、林怡君、胡中宜 (2014)。〈復原力增進方案在少女安置機構之應用與反思〉，《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1，93-121。
- 【Chen, Y.-F., Lin, Y.-C., & Hu, C.-Y. (2014).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upon a resilience enhancing program for young girls in residential car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1, 93-121.】
- 陳俊仲 (2009)。《育幼機構院生的多重弱勢歷程研究：兒童保護或社會排除》。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Chen, C.-C. (2009). *The study of multi-disadvantaged course of youths in children's home: Children protection or social exclus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 陳俊仲 (2011)。〈育幼機構獨立生活方案的運作模式與推行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34，400-413。
- 【Chen, C.-C. (2011). The model and problems of 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 in children's hom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34, 400-413.】
- 陳思穎 (2012)。《安置及教養機構離院個案就業歷程之社會排除經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Chen, S.-Y. (2012). *Care leavers' social exclusion experiences during employment cours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陳毓文 (2008)。〈國內接受機構安置少年憂鬱情緒之探究：問題陳顯與解

釋因素》，《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1(1)，75-101。doi: 10.30074/FJMH.200803_21(1).0004

【Chen, Y.-W. (2008).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mood of adolescents in residential group care.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1(1), 75-101. doi: 10.30074/FJMH.200803_21(1).0004】

彭淑華（2004）。〈弱勢兒童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台灣地區育幼機構之發展與省思〉，《兒童福利》，60，48-59。

【Pong, S.-H. (2004).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for the protection of disadvantage childre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lexive of child and youth residential placement in Taiwan. *Child Welfare*, 60, 48-59.】

彭淑華（2006）。〈保護為名，權控為實？—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觀點分析〉。《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5，1-36。doi: 10.29734/SJSW.200612.0001

【Pong, S.-H. (2006). Protection or control?—An analysis of workers' views on youth residential placement. *Soocho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5, 1-36. doi: 10.29734/SJSW.200612.0001】

彭淑華（2007）。〈機構安置：保護他（她）？傷害他（她）？—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眼中的機構虐待圖像〉，《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6，1-36。doi: 10.29734/SJSW.200706.0001

【Pong, S.-H. (2007). Protection or harm?—The pictures of institutional abuse by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Soocho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6, 1-36. doi: 10.29734/SJSW.200706.0001】

曾華源（2009年11月）。〈提升兒少安置教養機構服務輸送的品質—兼論建構兒少教養服務自我評鑑指標之重要性〉。「2009 兒少安置機構相關論文研討會」，台北。

【Tseng, H.-Y. (2009, Novemb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delivery for child and youth residential placement: Also, on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self-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ser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Related Thesis of Child and Youth Residential Placement, Taipei, Taiwan.】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數〉。取自 <https://reurl.cc/exdOZ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Child and youth*

-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s.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exdOZR>】
- 謝國雄（1994）。〈勞動力是什麼樣的商品？計件制與台灣勞動者主體性之形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83-119。doi: 10.29816/TARQSS.199407.0003
- 【Shieh, G.-S. (1994). Manufacturing consent under market despotism: The piece-rate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worker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17, 83-119. doi: 10.29816/TARQSS.199407.0003】
- Aarseth, H., Nielsen, H. B., & Layton, L. (2016). Conflicts in the habitus: The emotional work of becoming moder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148-165. doi: 10.1111/1467-954X.12347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larco, J. M. (2014). Coached for the classroom: Parent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hildren's re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5), 1015-1037. doi: 10.1177/0003122414546931
- Chou, Y.-C., & Schalock, R. L. (2007). Trends in residential policies and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aiwan.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1(2), 135-141. doi: 10.1111/j.1365-2788.2006.00850
- Grenfell, M., & James, D. (1998). *Bourdieu and education: Acts of practical theory*. London: Falmer.
- Jack, A. A. (2016). (No) harm in asking: Class, acquired cultural capital,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t an elite universit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1), 1-19. doi: 10.1177/0038040715614913
- Kuhn, A. (1995). *Family secrets: Acts of memory and imagination*. London: Verso.
- 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reau, A. (2015).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1), 1-27. doi: 10.1177/0003122414565814
- Lawler, S. (2005). Disgusted subjects: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identiti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3(3), 429-446. doi: 10.1111/j.1467-954X.2005.00560
- McNay, L. (2000). *Gender and agen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eay, D. (2004). 'It's all becoming a habitus': Beyond the habitual use of habitu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5(4), 431-444. doi: 10.1080/0142569042000236934
- Reay, D. (2005). Beyond consciousness?: The psychic landscape of social class. *Sociology*, 39(5), 911-928. doi: 10.1177/0038038505058372
- Reay, D. (2015). Habitus and the psychosocial: Bourdieu with feel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5(1), 9-23. doi: 10.1080/0305764X.2014.990420
- Reay, D. (2017). *Miseducation: Ine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Bristol University, UK: Policy Press.
- Robbins, D. (1991).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Recognizing socie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Sayer, A. (2005).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z, A., Flemmen, M., & Rosenlund, L. (2017). Social class, symbolic domination, and Angst: The example of the Norwegian social spac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6(3), 623-644. doi: 10.1177/0038026117738924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 gender*. London: Sage.
- Walkerdine, V., Lucey, H., & Melody, J. (2001). *Growing up girl: Psychosocial explorations of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Willis, P. (201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mpowerment or Constraint? Residential Child and Youth Care, Habitus of the Service User, and Class Effect

Chen, Wang-De^{*}, Chen, Bo-Wei^{**}, Lin, Yu-Hsuan^{***}

Abstract

Residential child and youth care state services ought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and provide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socially vulnerable. Ye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minds us that these young service users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adaption. Seldom can they become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in which residential care plays a crucial role. Nevertheless, the interplay between residential care and class inequality is underexplored. Employing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both soci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how the field of residential care shapes the classed habitus and the emotional landscape of its service users. Data from interviews with 15 ex-service users, alongsid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are used to sketch how the social field of the residential child and youth care service is operationalized, shaping the unequal psychic landscape of class for its resident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 Chief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hinese Childrenhome & Shelter Association, Taiwan.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Taiwan.

and improvement of residential child and youth care services can benefit from the voic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ervice user, who should be valued and centered in the service.

Keywords: residential child and youth care, habitus, class emotions, shame, class conditioning